

被征认的天赋：论天赋装置如何窃占了一个人确认自身的动作

比“天赋是社会建构”更深一层：为什么一个人不仅接受外部贴来的天赋标签，还把它当成自己对自己最私密的发现？本文命名“征认”——装置在你长出自己的确认语言之前，就把一份预制的本质递到你手里，让你以为那是你自己发现的。

作者 陈晓艳 · SDE 学员 · 约 1.5 万字 · 二〇二六年七月

摘要

本文试图追问一个比“天赋是社会建构”更深的困惑：为什么一个人不仅接受外部强加的天赋标签，而且还会把标签当成自己对自己最私密的发现？在教育学和批判社会学反复揭示天赋标签之虚假性的地表之下，有一个尚未被充分命名的操作在持续运转——社会装置不仅给个体贴上“是天才”或“不是那块料”的标签，更在他尚未长出属于自己的确认语言之前，就用一套预制的本质话语，替他完成了第一次“确认自己是谁”的动作。本文将这种操作命名为征认。征认不同于布迪厄的“误识”（Bourdieu & Passeron, 1970）——误识是把假的当成真的，征认是把“被给的东西”当成“自生的东西”。它也不同于福柯的“主体化”（Foucault, 1975）——主体化描述的是主体被生产的过程，征认描述的是这一过程中那个最关键的环节：你用来确认自己存在的第一人称动作，是怎么被装置从你手里拿走的。征认更不是“内化”的修辞变体——内化是“我接受了你对我的看法”，征认是“我误以为是我自己发现了我自己”。前者转移内容，后者窃占动作的所属权。在这个意义上，征认还与拉康的镜像误认（Lacan, 1949）形成了分层关系：镜像误认刻画了主体性原初结构中“把自己认成外物”的前语言条件，征认则揭示这一结构性缺陷如何被近代以来的知识-数字-制度装置系统性地利用、预制和闭合。全文追溯征认从命名到知识再到数字的三重装配过程，分析它如何通过制造“预制体感”和回收“自我确认的幻觉”来完成自我生产，并在最后追问：被征用的那个确认动作，在什么条件下才有可能被重新交还给一个正在发生的主体？

关键词 天赋；征认；确认的窃占；预制体感；第一人称幻觉

引言：一句存活了十二年的话，究竟活在什么地方

八岁的孩子第一次坐在钢琴前。他用右手食指试探着按出一个一个的音。母亲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对另一位家长说：“这孩子没这个天赋。”十二年后的年轻人坐在KTV包厢的角落，有人把话筒递过来，他摆摆手说：“我不行，从小就没有音乐细胞。”这个场景的熟悉感本身构成了一道难题——为什么一句随口说出的话，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存活十二年而毫不松动？[1]

已有的批判传统已经极尽所能地揭开了天赋的真面目。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天赋是文化资本的合法化外衣——特定阶层的惯习被学校体系误识为“自然才华”，再被假装公平地用以筛选所有人（Bourdieu & Passeron, 1970）。知识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智力测验不是科学的纯真产物，而是优生学、统计学和官僚分类术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偶然耦合（Gould, 1981）。哲学家告诉我们，天赋话语是一套规训装置——它将活生生的人纳入可计算、可比较、可治理的网格（Foucault, 1975）。这一脉深厚的学术传承，成功地将“天赋”从自然事实还原为社会的、历史的、偶发的建构，居功至伟。

然而，这套批判走到尽头时，有一扇小门始终没有被推开。天赋装置如果只是一个外部强加的标签，为什么它如此难以被从内部挣脱？为什么这个KTV里的年轻人，在没有任何人逼迫他、甚至在他身边人鼓励他“试试看嘛”的时候，仍然主动地、真诚地、不容置疑地，把那个“我没有音乐细胞”的标签掏出来，像举着一张终身有效的判决书？这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外部标签的案例，而是一个主动替外部标签说话的案例。这不是一个“被告知自己不行”的人，而是一个“确信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的人——那个“确信”的语气如此踏实、如此理所当然，仿佛它是从他自己生命的深处自己长出来的。

这就是本文的起点。天赋装置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能给一个人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而在于它窃占了一个更根本的东西：那个本应由主体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自己去慢慢走近、慢慢摸索、慢慢确认的关于“我在这个领域中是谁”的动作。本文将这种操作命名为**征认**。[2] 征认不是贴标签，虽然它以标签为材料。征认是装置把一套预制的、关于一个人本质的确认，递到他手里，

让他在接住这句话的同时，完成一次“自我发现”——让他以为这是他亲手从自己生命的最深处拧开的、关于他是谁的第一次确认。天赋装置的特权不来自它能说出你是什么，而来自它在你还没来得及长出属于自己的确认语言之前，就为你的确认动作预装了一个标准答案。从此，你用来告诉自己“我是谁”的那整套语言，都是在别人的模板上跑出来的。

一、命名：一句“你本就是如此”为什么不像一句判断，而像一次发现

回到那个学琴的孩子。母亲说：“这孩子没这个天赋。”这句话已经被批判过多次——它是刻板印象、是归因偏差、是社会建构。但批判者大多只分析了这句话的**内容**——它说的是什么、它对还是错。很少有人分析这句话的**形式**——它被说出来的时候，对听到它的那个八岁孩子来说，它在结构上属于哪一种话语。

请设想几个对比句。“你这次弹得不好”——描述行为，下一次可以不同。“学这个对你来说比较费劲”——描述难度，留了克服的可能。“可能你不太适合学琴”——委婉判断，仍然挂着“可能”的尾巴。“你没这个天赋”——主语是“你”，宾语不是“技能”而是“天赋”，时态是无时态的。无时态的宣告不给将来留余地。将来不需要被检验，将来只需要被证明。

语言哲学中有一个经典区分（Austin, 1962）：记述语报告既有事实，施为语在说话的同时创造它所陈述的事实。但日常命名中有一种特殊的话语，无法被这一区分覆盖。它不是记述——因为它描述的“本来如此”的东西在此之前并不曾被任何人记述过。它也不是典型的施为——它不创造新身份（像证婚人宣告夫妻那样），而是**宣布旧本质**。它不制造一个新状态，它认领一个“早已如此”的状态，并要求听者在接到这句话的同时，承担起那个被认领的“本来”。本文称这类话语为**认定语**。[3] 认定语不创造身份——它征用身份。它的暴力不来自它说出了什么，而来自它让听者去执行一个内在动作：它强制地邀请听者去“认出”自己身上那个被宣称的“本来”。

这正是天赋命名的核心机制。“你没这个天赋”是一句认定语。在它被说出的那一刻，一个确认包就被递到了孩子手上。他不是被告知“你做这件事很困难”，而是被教会了一个解释自己所有困难的根本句式：“因为我没有那个东西。”他对音乐的体验——手指不听使唤、耳朵辨不清音高、老师说的话我听不懂——是一些模糊的、尚未语义化的困难。这些困难本来可以向多个方向被理解。“老师讲得太快了”“这首曲子太难了”“我今天有点累”——每一种理解都把一个局部经验留在它本来的局部性里，不把它上升为关于自己本质的宣告。但认定语一旦出现，它立刻收束了所有这些模糊的、散落的经验，把它们统统汇入一句话：“这是因为我没天赋。”这是一种认知收束——模糊被压缩成明确，但压缩的代价是：其他可能被探索的理解路径，被从根部切断了。

最关键的一步还在后面。“他被告知了自己没有天赋”这个描述，跳过了整件事中最致命的一环。这个孩子在被说了这句话之后，做了什么？他沉默片刻，也许点了点头，也许什么都没说。但在他的第一人称空间里，一个微小的声音已经开始工作：“原来，我本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注意这个“啊”字——它指示的不只是“我知道了一个新信息”，而是一个更微妙的动作：**我发现了我自己**。这句话的时态被从母亲口中无时态的宣告，无缝地翻译为他意识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完全时——“我就是这样，我从来就是这样的，我以后也会是这样的。”征认就发生在这个翻译发生的瞬间。外部宣告在被收件人接住的同一刻，自动转码为内部发现。那个“本来”的话术，在修辞上完成了一次倒置：把一次完全的领受，装扮成了一次主动的发现。从此，“我身上没有音乐这个东西”不是我被告知的知识——它是我“自己发现的”真理。征认做好了。不是描述做好了，不是归因做好了，是自我确认这个动作，被外包给了那套外部话语。

这一分析可以与“内化”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4] 在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中，内化描述的是“个体将外部的社会评价接纳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米德的概化他人（Mead, 1934）、库利的镜中我（Cooley, 1902），都在这个逻辑里。内化的句法是：“他说我不行，久而久之，我也觉得我不行。”征认的句法与此不同：“他说我不行，而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说法时，就立刻感觉到——是的，我本来就是如此。他只是说出了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但一直没说出来的东西。”征认的句法里有一个内化所没有的结构元素：那个“第一次听见”就立刻被体验为“我本来就知道”的即刻性。内化是外部判断在时间中缓慢渗透进来的过程，而征认恰恰在渗透开始之前的那个瞬间，就已经预先关闭了渗透的必要性——因为它把那个判断接种在了听者对自己“本来就如此”的那个确认动作里。内化需要时间将外部内容“搬进”自我。征认不需要搬运——它一出现就直接站在自我的最里面，说自己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

这一区分的理论收益是实质性的。如果天赋标签只是一个被内化的外部判断，那么它的解法就是：通过批判认知，将这个已经内化的判断重新外化——“这是社会贴给你的，不是你本来的自己。”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教育干预。但如果征认的分析是对的——如果那个天赋标签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外部判断”的形态被接收的，而是以“你自己发现”的形态被接收的——

那么，批判认知就无法轻易解开它。因为你不能告诉一个人：“你以为是自己的那个发现其实是外部给你的。”这句话的破坏力不是认知层面的，而是存在层面的。它不是在纠正一个错误的知识，它是在拆毁一个人赖以确认自己是谁的那根柱子。征认之所以比内化更难以被解除，原因就在于此：内化可以被认知修正，征认必须被一场新的发生所替代。

更具体地看，在制度层面，一个教师对孩子做出天赋判断时，他身后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授权文件——不像证婚人那样有法律背书。但他的“命名权”来自一种分布式的非正式授权：家长付费的默许、培训机构的资质包装、社会对“专业判断”的惯常信任。信息不对称是这一授权持续运转的杠杆：家长听不出孩子当下演奏中的技术细节，但老师能——或自称能。这个信息差使得家长在当场难以做出有效的反驳。而他的沉默，恰好是装置所需要的唯一的社会缴款。沉默被老师——也被在场的其他家长——解读为默许。接下来的差异化资源供给就不再需要任何人明确下令：老师不再推荐更难谱子；家长不再打听下一个更好的老师；在升学与学琴的时间冲突中，放弃后者变得更轻巧。这些行为的每一次发生，都构成对原初认定语的再生产。你的行为在说：“是的，他就是没有天赋。”但你没有这么说，你只是做了这些行为。装置的精妙处就在于此：它不需要你签字画押，它只需要你的行为在客观上遵守判决；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为它工作了。

到了这一步，征认的初级形态的轮廓就清楚了。它是一个动作——不是从外向内“贴标签”，而是在内向外的通道上，预先把一个确认塞了进去，让那个往外舒展的第一人称，在第一个岔路口就以为自己碰到的是自己的心意。它在命名“你没这个天赋”的同时，把“发现”这个动作的可选属主，从孩子自己，转交给了那个先于他存在的分类世界。

二、知识：匿名的权威为什么比一个具体的老师更难反抗

初级命名有一个结构性的脆弱：它是人的判断。而人的判断，可以被另一个人推翻。在只有师徒口耳相传的时代，一个被前一个师傅判为“没有天分”的孩子，在下一个师傅手里被重新发现的事并不罕见。这扇通向后门的路始终开着——不是制度有意给你开的，而是因为民间命名无法做到信息的跨情境封闭。换一个师傅，那个说“你没天赋”的声音就被留在了旧情境里，你的新师傅没听过那句话，也不预备为它负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知识体系开始系统性地修补这个缺口。比奈受法国政府委托开发智力测验，初衷是识别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远非对他们做出永久定性。但工具被造出来以后，它的使用方式就不再由创造者的初衷决定了。当特曼将智力测验引入美国时，他明确以优生学的预设作为理论地基——智力是遗传的、不可变的、稳定的终身特质。这一预设并非来自对儿童认知发展的追踪研究（彼时尚不存在这种研究手段），而是作为未经检验的先验，直接在统计学工具的常规使用中操作化、被标准化、被具象为一整套测验常模。统计工具并没有“证明”遗传决定论——它把遗传决定论作为操作前提编入了自己的常模体系，然后每一次测试结果，都反过来“印证”了那个从未被证明的前提（Gould, 1981）。

这一阶段的征认升级，不只是一个精确化过程。如果只是把“老师说”换成“研究表明”，那只是换了同一个确认操作的后台服务器，并没有改变确认的结构本身。真正发生的改变是：确认的**来源**被注销了。

初级命名是有来源的——“这是王老师说的。”这个来源标记虽然微弱，但它给被征认者保留了一个在结构上可以去质疑、去反驳的把手。他可以想：“他是不是对我有偏见？”“他是不是那天心情不好？”“换一个老师，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质疑也许在实践中无力，但它们在逻辑上存在，这就使得被外包出去的确认还留着一扇可以被试图拉回来的门缝。

知识武装后的命名，把这扇门缝关上了。一个孩子拿到一份智力测验报告，上面写着“总体智商位于常模第23百分位”，这份报告上没有签名。它是“测试显示的”，不是“王老师判定的”。匿名的报告不给你任何人格化的抓手。它不说话，不做表情，没有你可能不喜欢的腔调，也没有对你严苛到让你感觉到不公的那种个人性。它只是沉默着，把结果放在你面前。而正是这种沉默，剥夺了你抗拒它的第一人称入口。你可以反驳一个人，你怎么去反驳一份没有发话人的报告？你的抗拒无处可去，最终只能弹回你自己：你开始想，是不是真的是我有问题。

这一步的升级，在概念上可以精确地区别于布迪厄的分析。布迪厄的合法化暴力（Bourdieu & Passeron, 1970）依赖于文化解释体系——那些被支配者被说服，相信某些品味是自然的、某些能力是天赋的。说服的逻辑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对话、可以被争论的论证空间——哪怕这个空间是倾斜的，论证是偏斜的。而匿名化测试的操作路径避开了这个论证空间。它不给你理由，它只给你结果。你不是被“说服”相信自己是低智商的，你只是拿到一个分数，而这个分数在制度里的后果——不能进快班、不能被推荐去竞赛——正在执行它对你的分类。你不必被说服。你只需要在被分类的程序里往下走。[5]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Gardner, 1983）为这场分析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在话语层面，多元智能打破了传统单维

智商观的垄断，承认了多种不同的能力形态——身体动觉、音乐、空间、人际——都可以是“智能”的正当容器。但在机制层面，它并没有撤销征认的结构本身。确认仍是从外部给出的，它只是扩大了可供发放确认的目录范围。一个孩子逃脱了“数理逻辑不高”的征认，可能正好落入“你或许有身体动觉方面的天赋”的另一张网。征认的内容换了，征认的操作依然在运行。多元智能理论看似瓦解了天赋话语的单维性，实则把征认的网络织得更密了。

到了这一步，征认的深度就和初级命名阶段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命名时代，你说“我没有天赋”时，这句话里还隐约摸得到一个来源——“老师说的。”在知识武装阶段，那个来源蒸发了。背后不是任何一位具体的老师，而是一整套叫做“关于个体差异的客观知识”的陌生声音。你说不出这是谁说的，因为谁也没说——是数据表明的、是研究证实的、是统计显著的。征认的操作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征认者不仅被剥夺了对判断提出质疑的权利，他甚至在拿到判断的同一刻，就已经拿不到那个可以让他去质疑的判断者了。装置的作者消失了，只剩下收件人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三、数字：当判断不再是可以被争辩的“说法”，而变成了只能被程序输出的“读数”

如果命名制造了确认的来源幻觉，知识注销了确认的来源，数字要做的则是第三件事：它连“争辩”这个行为本身，也从装置的运转中抹掉了。

一个孩子被老师说“没天赋”，他可以去找另一个老师重新开始。他被一套天赋理论定义，他可以拿另一套理论去反驳。当他的能力最终被翻译为试卷上的分数、被钉在排行榜上的位置、被编码为考级证书上的等级时，争辩的入口不是被驳倒了——而是被从程序的层面上关闭了。“没天赋”不再是一个可以被争辩的说法，它变成了一个读数。读数不与你辩论。你不能走到一台评分机器面前，质问它的赋分标准是否负载了某种未被言明的文化预设。机器不会回答你。即使你可以向人类教师申诉，申诉的路径终究会通向赋分标准与命题设计，而要真正撼动这一层的合法性，所需的专业知识门槛——心理计量学、项目反应理论、抽样理论——已经高到让绝大多数人无力攀登。

但数字的闭合力量，并不只在于它封堵了争辩。更重要的一步发生在制度层面。

当升学、就业、分流的硬性门槛被特定考试的成绩单边绑定时，分数的权威就不再需要任何人为它辩护了。它被嵌入社会运行的默认设置，被整个制度当作无须论证的操作前提来使用。而按这个前提行动的所有人——出题者、阅卷者、招生者、家长、考生——每一次按照分数逻辑做出的行为，都在无声地为它再生产一轮合法性。这就是“假设为真”：一种已经不需要任何理论来为之辩护的、被全体参与者的日常实践自动背书的状态。征认在这一刻闭合。

一个拿到成绩单的考生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份关于自己能力的第三方报告。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更深的存在姿态上的分裂。他在多年的摸索中，对自己正在长出的能力有一些模糊的、不稳定的、但属于他自己的感受——他或许隐约感觉到自己对文字有某种说不清的亲近、对旋律有某种身体性的反应。但这些感受在制度层面没有发言权。制度只认读数。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身份叙事不被制度路径排斥，你就必须压制、修正、乃至遗忘那些只属于你自己、却没有数字背书的体感，转而把“测试说我是这个水平”当作自己关于自己能力的基本事实。这不是一种外在的服从——不需要任何人强迫你。这是一种第一人称领地内的权力交接：你亲手把自己的自我感知，托付给了一行你自己没有参与制造、也无力质疑的阿拉伯数字。征认从命名时代的“被告知”，经过知识时代的“被匿名地告知”，最终在数字时代变成了“被你自己用读数的形式，告知你自己”。那个最初由母亲口中说出的“你本就是如此”，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它的终极形态：不是外面有人对你喊这句话，而是你自己看着屏幕，在心里替世界对自己说出这句话。

这一步的历史装配顺序值得被清楚地交代。标准化数字系统在二战后大规模普及，但它并非取代了此前的命名与知识——它是收编了它们。教师在小学教室中给孩子的非正式判断，已经在一个由全国统一考试分数构成的大数据网格中运转。一个老师给一个学生“有数理天赋”的判断，如果这个学生在标准化数学测试中持续得分位于高位，这个非正式判断就被数字为它加了钢印。而上一章中所描述的“知识匿名化”，也在这一层被数字系统物理化了——测试的设计、赋分、常模建立需要的正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知识体系，但到了分数呈现时，这些知识的痕迹被一个单纯的阿拉伯数字抹得一干二净。命名、知识、数字，不是三个先后出现的独立阶段，而是一个逐步耦合的装配过程：后出现的不是淘汰掉前一个，而是用更强的逻辑把前一个的功能承接、加固并匿名化到位。

这个装配过程一旦稳定，征认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结构：一个人不是被数字告知“你是谁”，而是在每一次查看成绩单、每一次对照排名表、每一次在报考系统里输入准考证号的动作中，一遍又一遍地自己重新确认了“数字告诉我的这个我，就是我”。

四、循环：装置如何让每一次外部裁定都穿上“自我发现”的外衣

上一章描述了数字如何收编命名与知识。本章要追问的是：三重动力耦合之后，装置得以自我维持的那个核心转轴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一个已经被多次描述过的闭环：数字排名制造区分，区分被日常语言翻译为天赋命名，命名启动差异化的资源供给，差异化的资源供给在时间中累积为真实的表现差距，而这一表现差距则被下一轮数字排名“证实”为天赋差异——装置生产出它声称只是“在测量”的差异（Merton, 1948）。这个闭环构成了天赋批判的基本教义，它也足够锋利。

但征认的框架要求我们把一个问题推进到这个描述所没有触及的那一层。这个闭环的操作依赖于一个隐含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整个闭环就会散架。这个条件就是：在装置的每一次运转中，那个接到外部裁定的被征认者，必须不是把裁定体验为一次外部的入侵，而是体验为一次内在的、私密的、自己对自己做出的确认。“你本就如此”不是一句你从别人那里听到、在意识里挂起、然后转身忘掉的话。它是一句你把它从别人那里接过来，放进自己的第一人称领地，然后在每一次面对相关情境时，自己对自己又说一遍的话。装置的最精密的工程，不在于它做到了前半——把裁定送达你手中。那只是信使的功能。它的最高手笔在于它做到了后半：让你以为送这封信的人，是另一个你自己。

这个判断可以在一个我称之为“竞赛班幻觉”的具体案例中看得更清楚。一个孩子在小学阶段被数学竞赛选拔体系筛出，进入“竞赛班”。从这一刻起，他身边围绕的是经过同样筛选的同侪，配给的是当地最高水平的竞赛教练，每天做的是远超常规教学大纲难度的习题。三年后，他在全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这个一等奖被学校写入荣誉榜，被地方媒体简化为“数学天才少年”的标题，被培训机构编入“天赋儿童培养案例集”。这个叙事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小心翼翼地把那道原初筛选藏了起来——“仿佛那个一等奖，是那颗‘数学大脑’自己长出来的必然结果。”

但这还不是征认最需要被分析的那一层。更深的一层发生在当事人自己的第一人称体验里。在三年浸泡之后，他在数学活动中切身体验到了流畅感——解题时思路连贯、不费力；胜任感——遇到难题时虽然也要挣扎，但最终总能攻克；愉悦感——每次解题成功后获得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同侪的钦佩目光，这些反馈带来的满足让他在情感上向数学活动粘得更紧。这些体感对他来说，是“我本就擅长数学”的不可推翻的内在证据。没有人能告诉他“你体验到的流畅感不是真的”，因为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真的——他真的感到流畅。

但这恰恰是装置的最高手艺。这些体感不是某种先天潜能的自然表露，而是持续三年高强度差异化资源灌注后，系统的自然产出。流畅感不来自他“先天对数字敏感”的神经构造，而来自他每天比别人多做了四个小时针对性训练后，神经突触高度优化的结果。胜任感不来自他与生俱来的“数理直觉”，而来自他被安放在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难度梯级始终保持在“最近发展区”内的习题序列里——每次被分配给他的题目，都恰好难到让他需要努力、又不难到让他失败。愉悦感不来自数学本身的美，而来自三年里每一次解题成功后老师、家长、同侪反复给予的、持续不断的、多层次的社会性正向反馈。这些体感都是真的。它们只是不是**自己的**——不是从他的某颗独一无二的生命种子里自己长出来的。它们是装置在他身上定制出来的，但被定制的体感和自己长出来的体感踩在同一个第一人称地基上，他把脚放上去的时候，摸不到任何接缝。他能摸到的就是那种流畅、胜任、愉悦——因为装置替他预制的，和他自己原本可能长出的，共用着同一种第一人称的湿度和温度。

正是在这里，征认触碰到了它最深的一层机制：**预制体感**。 [7] 装置不禁止你体验自己的生命——它只是在你尚未长出这份体验之前，就已经为你预先种植了一份体验，让你在体验它的同时确信这是你自己栽培的果实。这就是征认与单纯的外部评价最为根本的差异。外部评价说“你不行”，你可以绕开它，去找另一个领域寻觅自己的胜任体验。但预制体感告诉你“你在这件事上很行”，并让你在这套体验里过活好几年，你拿什么去怀疑这份体验的真实性？你不是在捍卫一个外部评价，你是在捍卫你自己的**体感**——而这些体感恰好就是征认装置自己生产的。

更精密的是，在装置的这一轮运转中，被征认者不但获得了“我擅长数学”这个确认的内容，他还获得了更根本的一样东西——“这个确认是我自己从我的体感里发现的。”确认的属下权，被装置在这一次发放里再一次地、更深地、用体感这个最无法被他人证伪的材料缝进了当事人的第一人称里。这就是征认的自我生产在操作层面上的精密度所在。装置不只需要人们接受它的裁定，它需要人们在每一次接受时都重新为自己制造一个“这是我自己确认的”的幻觉，并用自己真实的、不可转让的第一人称体感去为这个幻觉作保。因为正是在这个幻觉所提供的地基上，那些差异化资源供给才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畅运行。一个确信自己“本来就擅长数学”的孩子不需要外力的强迫去学习数学——他会自己去学。他会自己去找题做，自己去报名周末训练班，自己在被难题卡住时咬牙继续而不是放弃。装置不需要在每个孩子身上派驻一个督工，它只需要在每一个被选中者的第一人称领地里，种下“这是我自己发现的我”这棵树。往后，他对自己天赋的每一次证实，都同时在浇灌这棵树。

这也是为什么装置能抵抗住如此之多的外部批判而岿然不动。批判者们反复向公众论证“天赋是社会建构的”“考试成绩不能代表能力”“多元智能才是真相”。这些论证在认知层面或强或弱，但它们在实践层面有一个共同的盲区：它们把征认当成了一种**认知错误**来处理。征认不是认知错误。它是一种**体验的真实**。这个孩子真心地体验到自己解数学题时的流畅和愉悦。这份体验的质地是真实的，不可被认知论证所剥离。批判能告诉他“你这份体验是被差异化资源灌注出来的”，但批判不能替他取消这份体验曾经真实地在他身体里流淌过的事实。这才是征认最难被消解的一层——它生在体感里，而体感，是最无法被论辩撬动的第一人称事实。

更不可逆的是装置对早期裂缝的修复。在只有局部命名没有跨系统数字排名的时代，被一所学校判为“无天赋”的学生，换一座城市、换一所学校，还有重新被定义的可能。这至少保证了征认在早期阶段还不能完全闭合。标准化考试与全国统一分数量表将这些曾经散落的局部命名编织成一张全国可流通的网络。你换一个区，中考的分数不会变。你换一个省，高考的排名仍然咬住你不放。那些曾经大量存在的第二次机会，被系统性的信息流通和制度性的统一标准从装置中排挤了出去。征认的可逆性被降到了历史新低，装置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自带免疫系统的、会自己修复自己裂隙的有机体。

但这个比喻本身，正是本文在论证中必须拒绝的诱惑。装置不是有机体。它没有意图，没有设计者，没有单一的中央控制。这个看起来像“闭合循环”的东西，它的自我维持是从无数分散的社会行动——老师的一次随口判断，一个家庭的沉默，一个培训机构的广告词，一份考试大纲的微调——的交汇中，事后被我们辨认出来的一个涌现模式。这些行动彼此之间并不需要协调，它们只需要每一个行为都在同一个逻辑——天赋是真实的个体内部特质——所划定的轨道内运行，就已经足够让这个循环在几十年里自我维持下去。这个循环的核心转轴不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中，它嵌在每一个行为都替前一个行为作保的连锁反应里。征认不是一个“装置”在操作的阴谋，它是一种**社会发生学上的沉积分层**——每一个微小的认定动作，都在前一个认定的地层上再沉积一层，直到那个最初只是一句话的东西，被成百上千个后续动作固结为一整座无法被一个人独自推翻的岩层。

五、征认与它的三个理论邻居：误识、主体化与误认

一个不可还原的分析概念，必须证明自己无法被邻近的、已有的概念所覆盖。本章依次面对三场必须赢下的对勘。

与布迪厄的“误识”对勘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体系把特定阶层的文化惯习自然化为“天赋”，被支配者将这种历史的任意性“误识”为自然禀赋（Bourdieu & Passeron, 1970）。他们相信了假的——把“我家里有很多书”的阶层优势，误认为“我有文学天赋”的个人才华。破除误识的理论路径是：揭示误识背后的符号暴力运作机制，让被支配者看清“原来这不是天赋，只是我家庭背景赋予我的文化优势。”

征认描述的现象与误识有交叠——两者处理的都是“把非自然的东西当成自然”的机制。但两者在机制核心上存在实质差异。误识的理论预设是有一个“真的”存在——就是这个社会分类的任意性、阶级的惯习。这层真相被文化体系遮蔽了。揭露误识的操作，是把这层遮蔽揭掉。这可以在认知层面完成。事实上，大量批判教育学者多年来带着学生读布迪厄、解构自己所受的评价，确实帮助不少学生在认知层面完成了这条修正——他们知道了“这不是天赋，这是文化资本。”但他们中有多少人，从这一认知修正，进一步走到了“从此我不再用这套评价体系来确认自己是谁”？很少。原因不是他们不够觉醒，而是：在误识被揭穿之后，主体仍然需要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他手边没有另一套可以被真实地体验为“属于他自己”的确认语言，他的确认动作就会落回装置的旧槽里——因为那旧槽是他唯一会的、也唯一身体性地拥有的确认方式。这就是误识批判的实践困境：它给出了一套知识诊断，但没给出一套发生学上的替代方案。

征认的分析正是要解释这一困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征认不是“你把假的当成了真的”，征认是“你在这个把你当成真的的过程中，用的那个确认动作，本身就来自装置。”征认给你的是确认的**功能**，不是确认的**内容**。当认知修正告诉你“内容是错的”，它没有同时给你一个**新的确认功能**去替换旧的那个。所以旧的确认功能继续运转——它会接过修正后的新内容（“这都是文化资本”），然后用它继续运行同一种“确认自己”的操作。这就是为什么拆穿了误识之后，征认可以继续存在。在认知层面你已经不信那个标签了，在存在姿态上你仍然在用它来确认自己不是那块料。误识被修正了，征认毫发无伤。

与福柯的“主体化”对勘

福柯的“主体化”（Foucault, 1975）描述的是权力/知识如何将个体塑造成特定类型的主体——精神病人、罪犯、学生、同性恋。权力不是禁止你做什么，而是让你成为某种人，并让你在成为这种人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服从体验为自由的、或至少是自然

的。征认描述的现象无疑发生在主体化的框架之内。

但关键区分在于：主体化描述的是主体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与结果**——一个在分类、制度与自我技术中被做成了某种形态的人。征认追问的是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个更具体的环节：那个被塑造成某种主体的人，他在确认“是的，这就是我”的那个时刻，他拿来执行这个确认动作的那套第一人称工具，是从哪里来的？

福柯的分析通常停在这一层的外面。他展示精神病学如何说“你是个疯子”，然后整个制度系统如何按这种分类对待你，你如何在反复的规训中逐渐学会按照分类来规制自己——按时吃药、定期复诊、用“我是个病人”来解释自己所有的不合规范行为。但在这整个链条中，有一个环节是福柯的框架较少去解剖的：“我是个病人”这句话，当它从你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当它携带的是一种确定的、踏实的、不再犹豫的自我确认语气时——那个确定语气，那个让你不加怀疑地去认同这句话的那种第一人称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精神病学教科书里抄袭来的。它必须经过一种第一人称的转码，经过一种“对我来说这是真的”的体感认证，才能成为你用来确认自己的那句话。主体化为你准备好了分类，分类可以贴在档案上、写在病历里、被制度性的话语反复复述。但要把分类变成一种你自己对自己发出的确认——这需要你做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就是征认所描述的操作。

征认在主体化的链条中占据的位置是：把外部提供的分类，转化为第一人称确认。主体化解释了前者，征认解释了后者。它们不是竞争者，是分层关系。主体化提供的是被分发的身份的谱系，征认提供的是那个身份被植入第一人称内部的确切机制。主体化可以解释“你怎么被做成了这种人”。征认进一步追问：“你在被做成的路上，哪些本应是你自己完成的第一人称工作，被装置替你完成了？”

与拉康的“误认”对勘

拉康的“误认”（*méconnaissance*）（Lacan, 1949）是本文在对勘中必须面对的最为切近的对手。在镜像阶段，婴儿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整体形象，以为那个形象就是“自己”。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误认——主体把自己认同为一个外在的、被给定的形象。从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他者。主体性的根基里，埋着一个错误的确认。

这与征认的结构有极强共振。征认描述的正是：你把被告知的“你本就是如此”当成“我自己发现的自己”。这看起来像是镜像误认在社会层面上的一次重演。如果征认只是拉康式误认的别称，那么本文的核心贡献就将被降格为一次术语替换。

我认为征认切出了拉康未能覆盖的一个更精确的层面。拉康的误认是一种**结构性的、前语言的条件**——它是每一个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时都必须缴纳的入场券。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人能逃掉误认，没有“不被误认”的入口。征认不是要在这个普遍结构上再加上一层。征认处理的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当这套关于确认的结构性缺陷被近代以来的命名-知识-数字装置**系统性地利用、预制和闭合**时，会发生什么？

拉康告诉我们“确认自己”这个动作，从一开始就有着错认的结构。这是一个悲观的、但精确的、关于主体性普遍条件的陈述。征认不否认这个条件。它追问的是：如果这个本来就脆弱的第一人称确认动作，不是被主体自己在漫长的生命实践中笨拙地、试探性地、充满裂隙地去接近（哪怕每一次接近都包含误认），而是被一套匿名的社会装置在他出生时、在他入学时、在他第一次参加标准化测试时，就用预制的、可互换的、不允许重新校准的确认模板提前填写完毕——那么，会发生什么额外的事？拉康的误认是开口，征认是开口之后被填进去的那页纸。开口是结构，被填进去的那个内容是制度。漏掉这个区别，就会把所有的确认都还原为同一种误认，从而失去对**不同确认被植入的不同方式**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度，正是征认想要建立的。[6]

这也是征认与阿尔都塞的“询唤”（Althusser, 1970）可以区分的地方。阿尔都塞的经典场景——警察喊“嘿，你！”，你回头，在那个回头的瞬间你被询唤为主体——与征认共享了一个洞察：主体是在被外部叫唤中“成为”主体的。但询唤是一次性的、开关式的。征认不是一击。征认是持续地被喂给确认素材、被组织成一种对“被确认的自己”的归属与忠诚的那个更缓慢的、用几十年时间层层沉积的长时段工程。询唤描述的是主体化的那一击，征认描述的是这一击之后，你如何把自己拴在这道击痕上，并从此把这道击痕称为“我自己”。

六、那个确认动作，能还回去吗？

如果本文的判断能够站住——天赋装置的核心操作不在它给出了错误标签，而在于它窃占了一个确认动作的所属权——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不再是浅层的“改变天赋话语”或“废除考试”。那是对内容的修改和制度的改革，它们是必要的，但它们对付不了征认。征认不活在内容里，征认活在功能里。它活的是那个用来确认自己的第一人称动作，在被外包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那

个空洞里。拆掉了装置，那个空洞并不会自动长出新的确认能力——因为那个能力在装置运行的漫长岁月里，从未作为“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被真正培育出来过。

于是通向一个最棘手的困境：如果人用来确认自身的第一人称动作，从来都不是他自己长出来的，那么把它“还回去”是什么意思？还给谁？谁去接住它？那个能接住它的“主体”——那个能在没有外部预判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式与节奏去确认自己在某件事上正在长成什么样的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他不是被遗忘了。他是从来没有被允许发生过。

这意味着征认的出路，不是拆掉旧装置，而是**创造条件让一个新的确认动作能在漫长的时间里自己缓慢发生**。这不是一桩知识启蒙工程——你不能通过讲解“征认”这个概念来让人们从征认中走出来。因为在你讲解的时刻，他所赖以接住你的讲解的那个自我意识，正好就是他用来执行征认的同一个确认结构。你用征认体去解构征认，那只手永远比被它解构的东西晚一步。被征认者需要的不是知识——他需要的是另一段生命史。

那个能把确认动作重新生长出来的土壤，必定是结构性地不同于学校、不同于考场、不同于任何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就把“你是什么”塞进你手里的制度环境的。它需要的不是废除天赋话语，而是废除天赋话语在时间上的抢先性。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中的若干尝试——长周期项目制学习替代标准化考试、过程性档案替代一次性分数、赋予学生多次重新选择路径的制度弹性——虽然没有明确地以征认理论为设计蓝图，但它们不约而同地把力气下在了同一件事上：推迟那个被外部语词钉死的“你本来就是”的到来的时刻。当一个人不需要在十三岁就被一次分流考试定义为自己“是这块料”还是“不是这块料”，当他被允许在十六岁从零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训练、在十九岁转向完全陌生的领域、在二十四岁时仍然可以从容地进入一门他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技艺——那么征所需要的那个抢先性就被瓦解了。确认没有被取消，它只是被一再地推迟，被一再地留白，直到主体自己开始从某些方向中获得一种无法被他人代为指认的体感——一种微弱的、不稳定的、甚至他说不太清楚、但会反复牵引他回到那个方向上去的内在回音。

这根回音就是确认动作